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中日文化

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尚会鹏 徐晨阳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北京 大 学 国 际 问 题 研 究 丛 书

中日文化

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 尚会鹏 徐晨阳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 尚会鹏, 徐晨阳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3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
ISBN 7-5078-2366-0

I. 中... II. ①尚... ②徐... III. 文化交流—中日
关系—研究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4200 号

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

著者	尚会鹏 徐晨阳
责任编辑	何清
版式设计	周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53304(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63560939 88541279)
印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97千字
印张	8.5
版次	2004年4月 北京第1版
印次	2004年4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78-2366-0 / D·92
定价	16.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北京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 编：梁守德

副主编：方连庆 潘国华

委 员：袁 明 李 玉 许振洲

黄宗良 叶自成 李义虎



总 序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精心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丛书”，就要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学术界的一件喜事。丛书内容丰富，涉及各个领域，意在与时俱进，追踪新形势，探讨新课题，论述新观点，显现新特色，在开拓创新上下功夫。

当今世界国际形势和国际环境已经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正处于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因此，在国际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上既要与时俱进，更要转换脑筋。当前特别要注意三个至关重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下面意见算是抛砖引玉吧！

第一、坚持国际问题研究的国家特色。

事物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离不开共性，但共性只能寓于个性之中，这是人所共知的哲学常识。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应强调国家特色。何谓特色？它指的是独特、特质、开拓创新。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就是突出鲜明个性，从各自角度，观察国际社会，依据与时俱进，探讨客观发展规律，说明新问题，提出新思维，得出新结论。特色是学科的灵魂。缺少灵魂的学科，毫无用处。特色总是同整体性和普遍性相联系而显现的。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强调国家特色，不是脱离整体和普遍性而凭空捏造，无中生有，而是要求在学习、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它拒绝的是教条式地全盘照搬，也反对否定一切，要求在继承和比较中创新。

国际问题作为学科研究，英、美、法三国最早，距今 83 年。特别

是美国的学科建设最为兴旺发达,仅国际关系理论,就有三次大的论战和无数次的论战,创建了近十个主要流派和几十种有影响的理论,在探索国际社会发展规律上有新建树,但都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显现了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特色,同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和美国国情、文化传统不无关系。美国原是英国的移民殖民地,也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分店,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同欧洲列强一道将整个地球瓜分完毕,开始以强国身份进入世界舞台,直接控制和主导国际事务。美国文化是基督教文化,美国常强调上帝赋予的“使命感”,常常扮演“救世主”角色,以“拯救世界”为己任。美国的各学派和学者深受熏染,无不打上深深烙印,呈现鲜明的美国特色。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依据这一文件,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最早在中国设置国际政治专业,开始正规地、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应该承认,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作为学科建设晚于美国。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国情和传统文化有重大的区别。中国曾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长期遭受西方列强的瓜分和掠夺,被迫卷入国际政治漩涡,经过长期奋斗,终以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登上世界舞台。今天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演变起来的发展中经济大国;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化传统上,是贯穿着“仁爱、和平”的“和合文化”主张的国家。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派和学者,应该自立于世界国际问题研究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应有自己观察世界、认识国际社会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弄清“权利政治”核心,从新的视角研究国际问题。

国际政治,尽管纷繁复杂,但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始



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长期以来，权力政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当前国际政治的新现象。权利政治，说到底就是反对强权，维护人权、主权与球权，充实完善人权、主权与球权，使三权相辅相成，实现完整的统一。

权利，主要表现为人权、主权、球权，均属合理合法的权力与利益，是现代文明的三大标志。人权是人的正当权利，主权是国家的正当权利，球权是国际社会的正当权利，具体表现为主权国家共同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以及其他国际组织所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

从历史渊源看，人权思想问世在先，主权法定最早，球权也因人权与主权的互动而随后登上国际舞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既法定了主权又宣布了球权的诞生。18世纪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正式法定了人权与主权。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和约》，到《国际联盟盟约》和《联合国宪章》，各国的人权与主权得到广泛的认同，从国内法扩大为国际法，国际社会的球权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涉及领域由少到多，不断拓宽扩展，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清算战争罪行的大前提下，妥协、协调，既维护主权又对等转让主权的結果。一部国际关系史，既是战争与和平史、大国争霸史、主权国家关系史，也可以说是球权演变史。

球权管理的是国际事务，主权管理的是国家事务，虽然球权没有主权的权威性大，但当今世界球权的作用不可低估，且越来越大，它已使国际社会开始从无序变为有序。

迄今为止，在球权的制订与实施过程中，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获取更多利益，各国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平等，从没有真正平等过。

但应当承认，球权反映了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提供了维护主权，实现发展的强有力保证。虽然球权的局限性大，主要以实力为



依据。但在公认的游戏规则面前,各国平等,国际行为规范在所有国家都适用,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进步意义,其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所以说,主权国家应当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行使球权,享有属于自己的应有权利,但要加强团结,努力发展自己,既遵循球权,按球权办事,又要改革球权,使其不断充实完善,用球权维护主权和人权。

当前,国际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向明显,文化多样化争奇斗艳,其最大共同点是,既百花齐放,又日益走向统一。但不是统一于世界政府和霸权领导,而是统一于市场体系和国家体系之中,统一于共同的国际行为规范中。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主权和人权的同时,必须承认球权,把它提高到一个重要地位,使主权既同人权,又同球权科学地统一起来。主权、人权、球权是紧密相联而活动于国际舞台的,既不能轻视其某一权,又不能相互割裂开来。三权的相互关系是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是重视球权的时候了。任何损害球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这就是说,必须把三权科学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观察国际形势,研究国际问题。权利政治同强权即公理的权力政治完全不同,是研究国际问题的新视角。

第三、抓住首要问题,科学界定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三定”:定位、定向、定标。

孙子兵法中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讲的是军事,也是政治。推而广之,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人据此将社会科学区分为“己学”与“彼学”两大类,颇有见地。己为彼用,彼为己用,彼己互通互联,互补互动,这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常见现象,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的重要途径。国际问题学,或国际问题研究,就是“己学”与“彼学”的结合,更需要知己知彼。国际问题研究中为什么要知己知彼?简单地讲,就是给国家定位。因为这是国际问题研究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中,谁是敌国,谁是朋友?谁是竞争对手,谁是战略伙伴?同谁对抗,同谁合作?必须进行科学的定位,并适应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相互关系。当前,必须正确判断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危险,研究主要打击目标。同冷战时期的霸权主义相比,冷战后的霸权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不再同社会制度相联,作为世界敌国对待,而是属于践踏国际法准则的政策和行为。有霸反霸,不涉及其他,这是正确的做法。“9·11事件”后,恐怖主义上升为世界公害。它与世界各国为敌,肆无忌惮地残害人类,既践踏人权,又危害主权,也无视球权,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必须有恐反恐,有霸反霸。

历史是一面镜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全球瓜分完毕,整个世界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最终联成一体,全球范围的国际问题开始出现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国际社会舞台。迄今为止,国际问题的发展演变,均以世界经济政治为基础,紧紧围绕国家权益运转,主要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大体经历了五个时期:(1)殖民主义体系形成与反殖民主义斗争时期;(2)帝国主义瓜分世界与反帝国主义斗争时期;(3)法西斯主义猖獗与反法西斯斗争时期;(4)两霸争夺与反霸权主义斗争时期;(5)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并存与反恐反霸时期。从国际问题发展演变的五个时期中,我们发现三个规律性的现象发人深思。这就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国际问题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始终不变的国家利益;国际问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但“永恒的主题”只有一个:战争与和平,只不过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国际问题纷繁复杂,曲折常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是围绕国家利益运转,表现为权利政治同权力政治的较量。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这些规律性现象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定向”:当前正在进入一个大转折时期,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已成为新时期影响全局的主要危险。不同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国



人间长期共存，求同存异，共同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开创人类美好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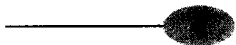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讲话在理”，说话办事要有准绳。当今世界，观察国际形势，判断国际是非，需要新的“定标”。标准不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也不是强权即公理，实力决定一切，名正言顺的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国际事务只能由世界各国共同协商解决，不能屈从于霸权，而应遵循球权，因为球权是以主权和人权为基础的，最能代表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世界上的事情，由世界各国共同管理，关键之处在于球权同人权、主权的统一。

国际问题研究的“定位”、“定向”、“定标”，从来就是“与时俱进”。为此，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破旧思想、旧认识、旧判断，破落后于实际或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思想、认识和判断，又立与实际一致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与时俱进”需要转换脑筋。

现在是转换脑筋的时候了！

梁守德

2002年6月22日
于北大兰旗营小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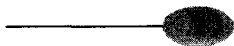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国家、政府层面：文化传统与 对外交往模式	(1)
一、文化与对外交往	(1)
二、美国的文化传统与美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4)
三、中国文化传统与外交模式的特点	(6)
四、日本文化传统与外交模式的特点	(9)
事例分析	(13)
第二章 企业集团层面：中日企业组织的特点	(61)
一、文化传统与企业组织	(61)
二、企业组织的参与方式	(62)
三、企业组织的统合方式	(64)
四、权力和责任模式	(66)
五、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67)
事例分析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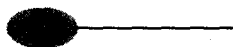
第三章 人际关系层面：“个人主义”、 “集团主义”与“间人主义”	(126)
一、“个人主义”与“集团主义”：跨文化研究	(126)
二、“间人主义”：中日人际关系的共同点	(129)
三、中国和日本人际关系的差异	(130)
四、“个人主义”、“集团主义”与生态环境	(132)
 事例分析	(133)
 第四章 个人行为层面：道德与行为模式	(173)
一、“情境中心主义”：中国人与日本人 道德与行为方式的共同特点	(173)
二、中国人与日本人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174)
三、中国国民素质提高之途径	(177)
 事例分析	(179)
 第五章 日常生活层面：“文化冲击”与 “跨文化理解”	(210)
一、“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	(210)
二、文化的相对性原则与不同文化群体的“共生”	(211)
三、为中日相互理解而努力	(213)
 事例分析	(215)





第六章 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从人与集团的角度考察	(243)
一、亚洲金融危机与亚洲式资本主义	(243)
二、个人与群体	(246)
三、“缘”与“契约”	(250)
四、东亚社会的变化趋势	(254)
后 记	(259)





第一章 国家、政府层面：文化传统与对外交往模式

一、文化与对外交往

根据现代通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利益关系。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国家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因此国家交往方面的冲突可以说首先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等最能直接反映国家所追求的利益的方面。但文化因素也是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因素常常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文化层面的冲突。美国学者 M. J. 麦哲指出：“文化，是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最近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都指出，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其他机构团体乃至个人，采取行动和自组运作的基本动力。这些著作还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①

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对外交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①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4，转引自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第一个方面,文化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重要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它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是构成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国家要维护的利益自然首先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等,但同时也包含文化方面的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看待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的对外政策一般是建立在谁是威胁和谁不是威胁、该支持什么和不应支持什么之类的基本判断之上的,而这些判断就受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回答。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安全。”^①从理论上讲符合民族或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都能体现出民族国家对整体利益的追求。虽然这种整体利益在特定情况下有时会被统治者所扭曲而成为他们追求私利的一种掩饰,但之所以能为其国民所接受,原因恰恰在于所扭曲的利益并不与国家的文化精神相悖逆。^②

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震惊了世界。人们在谴责这一惨无人道的事件之余也不能不再次思考关于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因素问题。现在看来这次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警示就是: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人们通常估计的要大得多。人们可以解释说这次事件是因为经济上与西方世界的落差造成的被剥夺感和绝望在阿拉伯世界凝结成了仇恨,也可以解释说美国不当的中东政策(主要表现为阿以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制裁伊拉克造成成千上万伊拉克平民的死亡等)得罪了广大阿拉伯世界,但这些至少不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现在已经弄清,“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大多出身豪门,受过高等教育并有在美

① 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② 同上,第5页。



国等西方国家生活的经历,因此无法用贫穷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毋宁说从这一事件中看出来的是更大的文化冲突因素。近些年随着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处于强势的西方文化(美国是其代表)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处于弱势的伊斯兰世界看着西方文化像癌细胞扩散一样侵蚀着整个世界并瓦解着自己的文化传统,普遍感到痛楚、恐慌却又无能为力。在西方文化面前穆斯林面临选择,但他们的“转型”要比东亚社会(中国和日本)的转型遇到更大的文化上的困难,因为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使他们面临更为严厉的神明的拷问。阿拉伯世界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普遍抬头的。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形式就表现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那种彻底禁止西方文化影响的做法和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行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经济上的冲突是如何与文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且前者借助后者的形式表达出来:恐怖主义者本·拉登公开以宗教的名义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反对美国,而美国也认为恐怖主义是对美国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挑战,声称向恐怖分子开战是为了保卫美国的自由和民主等。他们行为的背后可以说都有“文化利益”的追求,而文化利益的追求又是最能凝聚民众的。

第二个方面,文化对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过程、外交的方式和风格产生影响。每个民族国家的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制定外交政策以及采取具体外交行动皆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有密切关系,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把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文化价值观体现出来,从而给本国的对外政策打上明显的区别他国的烙印。

第三个方面,文化对从事外交的个人产生影响。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合,即他们体现了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利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有许多文化根源。

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是分析外交活动本身而是揭示隐藏在外交行为背后的文化因素。这个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偏见和误解,而这些偏见和误解通常是国与国构筑建设性关系的障碍。它也有助于把握一个国家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中长期的预测。在这方面著名的开拓性的研究恐怕要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类学家 R. 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与对外交往模式的分析。她认为日本人的义务与人情、义务与义理等价值模式、“各守本分”和忠诚尚武的精神等赋予了日本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也赋予了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与外部的交往方式。她的研究工作(后来集中在她的著名人类学著作《菊花与刀》中)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她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有的已经过时,但她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一个民族的对外行为的方法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下面我们试图从整体上对中国和日本的外交模式中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特点做出概括。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另一个大国——美国的情况作为第三参照物。

二、美国的文化传统与美国外交模式的特点

美国的外交模式表现出以下几个与其文化传统相关的特点:

1. 与“个人主义”文化传统相关的进攻性、对外征服性特点。

“个人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文化传统背景下的个人趋于把